

历史无法尘封 记忆终将苏醒

——旧籍里的抗战

在时间的长河中,有些历史虽曾被刻意遮掩,却终究无法被彻底尘封。钱念孙所著《无法尘封的历史:抗战旧书收藏笔记》一书,分抗战发生背景、日本侵略战略序幕、八年抗战历程等十一章,收录了大量弥足珍贵的书影、题字、题词与照片。这部书犹如一把钥匙,打开了记忆的库藏,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;它不仅是作者对所藏抗战时期书籍的系统梳理,更是一次对民族集体记忆的深刻唤醒。

多重视角 还原立体历史

抗战旧籍的珍贵之处,首先在于它们提供了多元的历史视角。这些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文献,既有中国人的亲历记录,也有外国记者的客观报道,甚至包括日本内部的战略文件。这种多维度的史料并置,构成了抗战历史的立体图景。英国《曼彻斯特卫报》驻中国记者田伯烈撰写的《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》(国民出版社1938年7月版)一书,以第三方视角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状。作者因电稿被日方扣押而决心成书,“力求真实,不存偏见”。这种曲折的成书过程本身,就印证了日军试图掩盖罪行的企图。书中保存的信函、文件与照片,至今仍是国际社会认知日本侵华罪行,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罪行的重要证据。

甲午战争期间担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所著《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》,则从侵略者的内部视角,揭示了1894年至1895年,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至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签订期间的对外外交内幕。此书原名为《蹇蹇录》,于1896年3月底由日本外务省印刷,作为内部机密读物,未对外公开发行。译者在日本留学时,重金购求到该书的流传本,于1929年推出中译本。译者在“小引”中明确指出,此书能使国人“一目了然”日本的侵略策略。这种主动译介侵略者文献的行为,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以敌为鉴的清醒认知。

《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排华惨案》(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1年7月印行)一书,清晰记载了这一作为“九一八事变”前奏的事件之起因、经过、影响及相关史料。书中明确揭示,万宝山事件与朝鲜排华惨案,是日本假借朝鲜农民之手蓄意制造的流血冲突,其目的正是为侵略我国东北寻找借口,进而完成舆论与军事上的双重准备。《日本论》(光明书局1938年5月版)的作者哈耶玛写道:日本在占领某块外国领土之前,总是预先在那儿造成它的“特殊利益”,即先派若干日本人到那儿居住,并投下一定的商业资本。然后它就宣称自己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,于是以保护侨民为借口,派军队到那儿为军事侵略做准备。如果军队遭到当地居民的反抗或发生“流血事件”,它就乘机派兵攻占此领土。如果当地居民害怕而不与日本兵发生冲突,日本军国主义者就自己暗杀本国侨民或士兵,再嫁祸于当地居民,堂而皇之地占领其领土。日本正是这样,侵占了东三省,挑起了卢沟桥事变。

以笔为枪 构建精神防线

抗战旧籍不仅是历史的记录,更是抵抗的武器。在民族危亡之际,中国知识分子以笔为枪,通过翻译、著述、出版等方式,构建起精神防线。

《日本的发展》(商务印书馆1933年7月版)译者梁大鹏在序言中写道,翻译此书时“正是日寇的飞机战舰袭击上海之时”,他将翻译工作视为“抗日期中个人工作之一”。这种将学术工作与抗日救亡直接联系的态度,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选择。邹韬奋的《小言论》(生活书店1933年1月版)是在《生活》周刊发表的言论汇集,每篇对时事加以评论,文笔犀利,眼光敏锐,多言人所不敢言、言人所不敢言,被誉为“民众最有力的喉舌”。他在自序中特别指出“对于抗日救国的文字特多,这是认为民族自救乃目前的首要图”。其另一著作《对反民主的抗争》,于1946年邹韬奋逝世两周年之际,以“韬奋出版社”的名义出版。这一细节体现出抗战精神在战后民主斗争中的延续。

钱念孙在书中收录的诸多文献,在主流的抗战叙述里较少被关注,而这些看似“边缘”的文本,恰恰蕴含着不少关键的历史细节。《陈案书状汇录》(章士钊律师事务所1933年5月印行)收录了陈独秀的自辩状和章士钊的辩护词,展现了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旗手在抗战初期的政治立场。陈独秀在抗战时期撰写的《我对于

抗战的意见》(《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》)《我们断然有救》《告日本社会主义者》等著作,不仅有他自题的书名与手迹影印自序,更在抗日战略防御阶段发出了“我们断然有救”的激昂呐喊。这句话既是对当时抗日意志不坚定者的当头棒喝,更是对千千万万抗日将士的有力鼓舞;文章见解独到、立场鲜明,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代思想家、政治家对时局的敏锐把握与深沉的爱国情怀。

《延安一月》(南京新民报1946年1月版)作为记者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的第一手纪实通讯集,书中收录《毛泽东先生访问记》《朱德将军的招待会》《文艺界座谈会》《端午节访丁玲》等经典篇章,还配有古元、彦涵、施展、秦兆丰等解放区画家创作的木刻插图。另一部《文汇报》则对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与关注;图片部分设有专题,展示了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多幅照片,以及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的特写肖像;文字部分以较大篇幅登载了毛泽东《论持久战》、朱德《战略和战术》等重要文章。这种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结合,不仅具备珍贵的史料价值,更直观反映了当时媒体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工作的关注与认可。

通俗传情 凝聚全民力量

抗战旧籍中还有一类特别值得重视:通俗读物。这些面向普通民众与将士的出版物,以最直接的方式传播抗战思想,号召力极强。

老向所著《抗日三字经》(三户图书社1938年版),巧妙借用传统蒙学体例,配以插图,读来朗朗上口、铿锵有力。书中开篇便直击国难:“七月七,卢沟桥,日本鬼,演野操,半夜后,奸计行,开大炮,轰宛转,夺天津,陷北平,文化地,鸟兽行,国人怒,世界惊。在上海,八一三,日本鬼,生事端,无原故,派兵船,陆战队,极凶顽,杀妇孺,屠老年,既无法,又无天,残酷状,不忍言。”这部作品由冯玉祥题写书名、老舍作序,1938年3月刊发后,同年4月即再版,成为动员民众抗战的经典读物。另一部《抗倭军官须知歌》(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39年7月版)则由冯玉祥创作,以五字歌形式简明概括抗日官兵的言行准则,方便将士记诵遵循。其中关于“爱民”的篇章尤为动人:“军官爱百姓,爱之如父母,民供我衣食,我作民公仆。军人不爱民,为谁保国土?本此去实行,作战如猛虎。”尽显军民同心抗敌的理念。这些名人的共同参与,提升了通俗读物的影响力。

《四大民族英雄:岳文威史集》(军事新闻社出版部1936年2月版)颂扬了岳飞、文天祥、戚继光、史可法四大民族英雄的忠勇和爱国情怀,编者明确表述,出版目的是“于以振奋人心,解除国难,效法先贤,复兴民族”。将历史英雄叙事与现实抗战需要相结合,是当时文化动员的常见策略。

翻阅这些印在《无法尘封的历史:抗战旧书收藏笔记》中已然发黄变脆的旧籍图片,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“饱经沧桑历经磨难的魅力”,更是历史无法被尘封的真理。钱念孙在《写在前面的话》中精辟地指出,这些文献具有“不随着时光流逝、朝代变迁、人事更迭而改变自己内涵的‘白热黑字’的魅力”。

以史为鉴 唤醒集体记忆

抗战旧籍的保护与研究具有重要价值:一方面,它们是反驳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证据,以实物形态留存了珍贵的历史记忆;另一方面,它们更提醒我们,知识分子、记者乃至普通民众,都曾以各自的方式记录和诠释抗战历史。

比如,哈尔滨工业大学(今哈尔滨工业大学)的中国学生们在节译《日本田中内阁侵略中国满蒙积极政策奏章》(即臭名昭著的《田中奏折》,1929年12月译印)时,在扉页写下的文字至今仍振聋发聩:“读者!假定你的心还在跳,你的血还在流,你的脑子里还印有中国的全图,那么无论你怎么忙,



钱念孙著《无法尘封的历史:抗战旧书收藏笔记》,2005年8月版。



老向著《抗日三字经》(三户图书社1938年版)

或是怎样忙,总该抽出一点时间把它读完。读完后,想想人家的计划、手段是这样的,我们呢?以什么手段来抵御?以什么工具来对付?”冯玉祥在1935年出版的《中国与二次大战》自序中,更是向国人发出沉痛呼吁:“同胞呀,中华民族已经逼至被判处死刑或无罪的关头了,热望共同奋起,有计划、有组织地迅速起来捍卫国家啊!”还有《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》,由章太炎题写书名、史量才题签,收录了这位爱国老人为抵抗日寇侵略所发表的文章、谈话、演讲、函电等。1932年10月,马相伯挥笔大书“还我河山”四字,并书小字附言:“去年九月十八日日本暴力发动强占我东北,今年三月又一手演成满洲伪国傀儡一剧。一周年间,河山变色,如此奇耻大辱,国人应奋起自救,不还我河山不止。”这些九十多年前的文字,跨越时空向我们发出叩问:面对历史,我们是否还保有同样的心跳与热血?面向未来,我们又该如何种姿态铭记与传承这段岁月?

抗战旧籍,我们应视为民族文化基因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些旧籍文献既是确凿的历史证据,也是珍贵的精神遗产。在数字化时代,我们应当以更开放、更系统的方式整理和传播这些史料,让更多人得以直面历史的复杂性与多元性;同时,抗战旧籍中蕴含的知识分子担当、民众动员智慧与文化创新精神,对当代文化建设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。

历史无法尘封,不仅因为纸页上的墨迹难以抹去,更因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终将苏醒、发声。这些抗战旧籍的发现与整理,正是这种记忆苏醒的生动体现。它们清晰地告诉我们:历史的真相或许会被暂时掩盖,但永远不会真正消失;民族的记忆或许会经历沉寂低谷,但终将在反思中重获前行的力量。

蒲湖

新作 述评

《少年读金庸》:对“金庸平行宇宙”的一次梳理

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文/图

2018年10月30日,金庸仙逝。多年后,时有“青年人不再读金庸”的说法传出。果真如此吗?潘采夫新书《少年读金庸》,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此问题进行了回应。

潘采夫是70后作家,金庸影响最大的群体,恰恰是70后这一代人。他们上中学时读金庸小说,看金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,视段誉、郭靖、张无忌等为偶像,并尝试像这些角色那样交朋友、闯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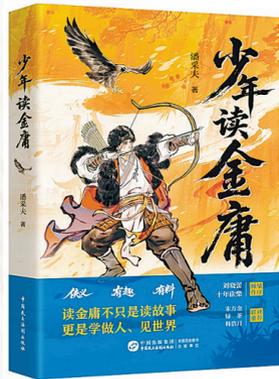
《少年读金庸》的出版,是对一代人青春的一次回顾,是对侠义精神的再一次追溯与探寻,亦是对金庸及其作品价值观演变的一次讨论。金庸早期作品充满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;中期作品开始对集体主义进行反思并重视个体价值的体现;晚期作品则实现了向现实主义的转向,非常奇妙的是,70后一代人的思想轨迹与之有很大概率的吻合,这可能是金庸的忠实读者与他们难以切断精神联系的原因,金庸的幸福也是他们的幸福,金庸的沉思也是他们的沉思。

潘采夫的这本《少年读金庸》,把沉思放在了文字的背后,他用轻松幽默的写法,介绍了金庸进入武侠世界的契机、

发展、转变等过程,梳理了“金庸平行宇宙”中主要代表作的支线与支线,评价了金庸笔下人物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,并就上述内容进行了交叉对比与提炼升华。作者将自己的成长故事与人生历练,不着痕迹地融入到写作与评价金庸的过程中,以金庸作品与角色为媒介,实现了一次与金庸跨越时空的交流。读完全书,会发觉作者已成为金庸笔下的一个人物。对于散落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金庸读者而言,何尝不是如此?他们也曾借成为金庸笔下角色的理想,完成了一次次的造梦,来实现自己在那个不存在的江湖里的“存在感”,来得到自己在现实生活里不曾得到的那种“得到感”。

金庸身上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,他的小说作为通俗文学也好,作为知识分子写作也好,都无法遮掩金庸对传统文化的热爱,还有对古典主义的遵循。曾被捧捧也曾被审视的金庸,完成了他在世间传播故事的愿望,他留下的文学财富与精神财富,仍然值得一代代新的读者去发现,从中得到“金子”(精神财富)或“钥匙”(理解文化的工具)。《少年读金庸》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路径,但很显然,潘采夫作为作者,并非只是从粉丝角度来肯定金庸,更是以平等的身份、开阔的视野,把金庸放在时间与历史的长河中进行打量,可以说,这本书里的金庸是真实可亲的,是朋友而非导师。

虽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手一本金庸的盛况难以再现,但青年人依然是爱读金庸的,在过去几年间,图书馆与大学所进行的阅读调查中TOP10或TOP20中,金庸作品还占有多个席位,金庸作品已经摆脱纸书特有的阅读环境限制,通过数字化方式走进青年人的心中。照此规律,少年读金庸的人数,在将来仍堪称海量。读金庸不是问题,能不能读懂金庸才是问题,愿少男少女们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,通过金庸这扇“窗户”,真切地看到或感受到一个时代曾经的丰盛样貌,并从其中获取对自己有启迪意义的片段。



《山河纪:从地理看四川》:别让灵魂“背井离乡”

“锦江春色来天地,玉垒浮云变古今。”蜀地的魅力,从来都藏在山川与人文之中。千年来人与文,皆与蜀地结下不解之缘。刘乾坤主编的《山河纪:从地理看四川》恰为这份羁绊注解;地理是空间坐标,更是人情底色,人与自然的共生,方是蜀地文明绵延的根脉。

书中述蜀地地理,不止于风光描绘,而是像位熟悉蜀地的向导,带领读者穿梭华盖山峰峦,观飞瀑如银练垂落,探溶洞内怪光陆离的地下世界;走进四川恐龙化石集中地,借一枚枚牙齿化石,回溯亿万年前的恐龙奔腾;掠过涪江河床“石龙过江”怪石,赏其天然浮雕雕凿的形态,品味水流侵蚀与地貌塑造的岁月痕迹;俯身细嗅龙泉山野蔷薇,仰望南北迁徙的猛禽掠天而过,远眺城市上空日照雪山勾勒出的天际线;探访深刻影响四川盆地与秦岭过渡带地貌格局的“大巴弧”——巴山峡谷百里褶皱层叠,极危物种崖柏于崖壁间倔强生长,既显自然伟力,亦藏生命韧性……

这些山川地貌并非孤立存在,它们共同构成了蜀地的生命场域,也让这里成了“文化避难所”。古言“鼓舞于上者为之风,习染于下者为之俗”,天府既承“上”之教化,自秦至元,取蜀常可定天下。中原烽火起时,更凭山川屏障护文明薪火,纵移民更迭、五方杂处,中原文化根脉仍

在。亦纳“下”之民风,都江堰润养千年,让成都平原水土恒常、物产丰稔,风尚随自然流转不褪。也正是这水土禀赋,让都江堰的水利智慧有了用武之地,为后续的人文繁盛埋下了伏笔。山川从未离开过人们门外,反而以宽厚的姿态,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坚实的根基。

盐,是蜀地文明的一抹亮色。富世井的第一捧卤水、卓筒井的钻井革命、桑海并超千米深井的纪录,还有西寨会馆里盛装的过往,都在诉说着四川井盐波澜壮阔的传奇。盐粒簌簌落下,不仅腌渍出独特的饮食风味,更沉淀出“盐有味”的自贡地域文化;“两千年来盐卤的浸染让这里的文化也沾染了盐的味道,是盐在这片土地上独特的结晶。传说、故事、诗歌、习俗、节日和庆典充满了浓浓的盐味;古道、水道、桥梁、街道、商铺,乃至一山一石的名称无不与盐息息相关。”“吃在四川,而味在自贡”的说法,正是自贡之盐联结人与自然的见证。

杜陵野老笔下“野老篱前江岸回,柴门不正逐江开”的景致,藏着人与自然最本真的栖居。如今那扇逐江的门,却在都市喧嚣中悄然闭合。这份疏离,原是一场精神上的“背井离乡”。正如蜀人对岷江、龙门山的依赖刻入骨髓,离了这片山川便失了地域根魂;现代人疏离自然,也似抽离精神土壤,灵魂难免陷入漂泊。杜甫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的期盼,既念民生栖居,更藏着心有所依的向往。这份“所依”,从来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居所,更是与山河相连的精神原乡,而我们恰在车水马龙中,丢了这方归处。

蜀地的故事早已昭示,文明的根,扎在山川大地。李冰治水,是与岷江“因势利导”的和解;杜甫咏山,是将自我融入自然的共情;川西林盘,是与天地共创生态的智慧……这份共生,让蜀地的风都带着人情温度,让生于斯长于斯的人,骨血里浸透着对土地的眷恋。蜀地灵魂,是山川的厚赠,它从不专属一隅,只赠予愿放下浮躁、倾听山河的人。

真正的“归乡”,无关远近,只在推开那扇逐江的柴门——重寻自然之根,让灵魂安于山河。

林安琪

